

【中朝韩日文化研究】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

崔雄权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 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 或是精神力量, 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 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 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关键词: 陶渊明; “和陶诗”; “和陶辞”; “朝鲜风”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11(2014)01-0062-06

收稿日期: 2013-11-20

作者简介: 崔雄权(1952—), 男, 朝鲜族, 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汉语学习》主编。

论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 毫无疑问, 中韩文学关系具有丰富的典型意义, 因为它凸显了中国文学在东亚文学影响研究中的许多规律性的问题, 陶渊明在朝鲜半岛的流播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因晚唐留学生和《文选》作为考试科目而为韩国古代文人熟识并接受的陶渊明, 不仅其作品最早被了解, 而且对其人其作的解读贯穿于整个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可以说, 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出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 或是精神力量, 或是艺术风格, 等等。正因如此, 陶渊明成为韩国文人心目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在这一接受过程中, 韩国的“和陶诗”、“和陶辞”从一开始的模仿、类同, 逐渐演化为富有韩国民族气息的一种文学样式。虽然在形式的外壳上还留有原来的印痕, 但其在风格创造、意象构筑、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幻, 最终甚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朝鲜风”格调。

“和陶诗”在韩国从高丽朝开始绵延不断。韩国古代文人非常推崇陶渊明的诗歌, 并以步韵、次

韵、从韵等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概言之, 所谓“和陶诗”就是高丽中期以后的诗人所作的“和陶诗”的总称。值得一提的是, 在“和陶诗”的创作中, 韩国文人更多地是通过苏轼来实现“和陶诗”创作的。

“和陶辞”是韩国文人唱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诗歌作品, 其第一人是李仁老。曹虹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韩国汉文学》一文中提出了以下三点: 一是采用集字作诗的方式, 二是诗体表达读后感, 三是依其韵而赓和之。^[1] 其实这是韩国“和陶辞”的创作特点, 但是其模仿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国文人诗歌创作的个性表现。

根据韩国学者南润秀在其著作《“韩国的和陶辞”研究》一书中所做的统计, 在韩国古代文学中, 自李仁老以来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唱和之作就有 150 多篇,^[2] 这还没有包括数量众多的“和陶诗”。可以说, 韩国的“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不是一时一地之作, 也不是某几个人的创作, 而是贯穿于韩国 1 000 多年的文学史的创作现象, 是集中了众多韩国文学家辛勤劳动的感情的结晶。这

样一来,对于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的分析,也是对中韩文学交流史和韩国文学史中的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的分析。

在韩国文学史上,进行“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的作家很多,如李仁老、李滉,李贤辅、金时习,等等。我们不可能分析所有作家的“和陶诗”与“和陶辞”,只能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在这些分析当中,本文最为关注的就是“朝鲜风”的问题。这一点不仅体现韩国诗人在接受和学习陶渊明时对于其本人和中国因素的关注和把握,而且也体现了韩国诗人独特的本土性追求和民族特色。

“朝鲜风”一词,源自于朴趾源的李德懋《婴初稿》的序文中,本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国风”而言的,是指能反映朝鲜人生活方式或内在情感的诗风。^[3]本文在这里借用“朝鲜风”主要是为了隐喻韩国古代诗人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中所蕴含的韩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感情等问题。

“和陶是一种很特殊的、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而在更加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吸引我们进行研究。这种现象不仅证明陶渊明的影响巨大,而且表明后人对他有强烈的认同感,表明陶渊明的作品具有普遍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说明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份的认同,表明了对于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4]在这里,袁行霈先生主要是就中国文学的情况而言的,但是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放在东亚文化圈内来进行思考也同样适合。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和陶诗”的创作是一个东亚文学的实践,同时,也正像袁行霈先生所说,“和陶”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

韩国的“和陶诗”和“和陶辞”创作基本也是如此。“和陶”不仅表达了他们对于陶渊明的艳羡,同时也表明他们希望走上陶渊明式的生活与精神道路。实际上,他们或是没有达到陶渊明那样的高度,或是其思想基础和陶渊明多少有些差异。在这些不同之中体现的是韩国“和陶诗”和“和陶辞”的本土化诉求或本民族特色,这是韩国的“和陶诗”和“和陶辞”与中国的“和陶诗”的又一不同之处。对于韩国古代“和陶诗”与“和陶辞”的独有特点的强调实际上也是希望在两者之间的分析中能够更好地把握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的

流变体系及脉络,进而体味陶渊明在韩国的独有而又巨大的人格与诗性魅力。

虽然韩国的“和陶诗”与“和陶辞”在形式上缺少一定的创造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在诗歌中没有实际的内容,相反,虽然诗歌形式本身的成就不高,但是在诗歌的内容及情感上,却时时刻刻表现着鲜明的自我。韩国古代的“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的“朝鲜风”的表现形式首先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映,其次是民族情感的传达与主题的直白的表露以及诗学意象的取舍。其中,对民族历史的反映表现着诗人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这时候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不只简单地“和陶”那么简单,而更成为了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民族情感在很多时候是通过民族历史来传达的,它与民族历史成为了“和陶诗”与“和陶辞”内涵的内和外的两面,并一起构建了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架构,不仅在诗歌风格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样态,而且在民族审美习惯积淀基础上对陶渊明诗歌中的诗学意象有着自己的取舍原则。

一、“和陶诗”与“和陶辞”对韩国民族历史的反映

很多时候,文学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和历史,并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韩国的“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虽然是在与中国的陶渊明进行唱和,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诗歌都是各个时代的诗歌,也是社会、历史的诗歌。它们在时代和社会进程交叉的那一刻通过表现诗人内心或苦闷彷徨,或悠闲自在,又或是俊逸潇洒的心情来直接或间接地书写历史。陶渊明的诗歌本身大多都是写景抒情之作,其后的唱和者基本上也是如此。因此在韩国的“和陶诗”或“和陶辞”中直接看到的社会、历史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多是诗人个人的历史,其中有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抑或是直接用抒情代替了叙事。而韩国古代文学的“和陶”者大多是各个朝代政治中的失意者,所以他们的“和陶”作品中的感情也多少带有消极、抑郁的色彩,这一点在李仁老那里就已经奠定了基调。因此,他在《和归去来辞》中言:“臧谷俱亡,荆凡孰存”,“望红尘而缩头,人心对面真九疑”,^[5]而这些诗句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质问。高丽后期的儒学大家李穡

在《读归去来辞》一诗中曾写道：“乾坤荡荡山河改，门巷寥寥日月迟”，^[6]虽然只是简单的两句诗歌，其中也没有太多的内容，但是却道出了山河易帜、改朝换代的事实，以及诗人面对这种事实的沉痛的心理感受。由于李穡生活于高丽与朝鲜朝换代之际，其诗歌中很多地方体现了这样的感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诗人在与陶渊明进行诗歌唱和时，有意无意之间总是从陶渊明本人的经历上汲取一些和自己相似的人生经历及感悟。这不仅在李仁老和李穡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后来的李滉、金时习、申钦等人的作品中也都是如此。比如，金时习的《和归园田居》大多描写他隐居深山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及其情感。^[7]而从实际的审美效果上看，这也不只是摹写个人的隐居生活那么简单，也更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韩国人民在经历兵变或改朝换代之后的生活状况。在申钦的某些“和陶诗”中，这种状况则表现得比较直接，如《和拟古（三）》中就有：“其傍吏民家，戟戟列周庐。伊我去故国，栖栖僦人居”^[8]这样的诗句，表现了当时兵戈相加、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其实，在韩国诗人的“和陶诗”中，这样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诗句不在少数，只是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得都非常委婉和曲折，其中的抒情成分更重于叙事成分，以至我们有时难免在无意中忽略了这些诗句的存在。也就是说，韩国诗人效仿并重视陶渊明诗歌的抒情本质，从而导致了其叙事功能的弱化。

二、“和陶诗”与“和陶辞”中对民族情感的反映

就民族情感本身来说，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主要是对祖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就这些诗歌的写作时代而言，它们还包含着诗人对君王的感情，并且在很多诗人看来，这种感情似乎更加重要，同时，其他很多的情感基本上都是从这种情感中派生出来的。或爱或恨，又或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成为了很多韩国古代诗人难以回避的现实及情感。李仁老因“武臣之乱”而退出政坛，我们在他的“和陶辞”中看到了很强的自我规劝的味道，但是其中也不乏对当今君主的怨恨，以及对于过去君主的怀恋，同时，还以其行动来彰显其态度。此后的李穡因身处易代之际，其诗歌中强烈地表现了对于李氏家族的恨和对于高丽王

朝的维护，并且由于这样的朝代更替使得其诗歌中难免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情绪。即使是到了朝鲜朝的李退溪，其诗中虽然很少看到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但是在诗歌内涵的深处，还是能体会到落落寡欢的情感。金时习则由于其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得其诗歌中的这种感情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实，从隐逸诗人对自身道路的选择上来看，其行为本身就表明一种态度。韩国古代诗人也是如此。他们的隐逸基本上是因为对当时政治或社会现实的不满而造成的，他们对某位君王的反对或者拥护都是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理念或思想的恪守与坚持，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君王的态度关系着其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但是，对于韩国众多创作“和陶诗”与“和陶辞”的诗人而言，他们对于自己身边民众的挚爱却是始终不变的。同时，这种对于人民的爱也多源于对祖国的爱。在古代，诗歌创作，特别是汉诗创作，很多时候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且这些诗人大多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对于底层人民的了解是比较贫乏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于人民强烈的爱。在很多时候，这种爱也是异常地深沉和伟大。李仁老在其诗歌中并没有多少表现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其后的李奎报虽然身处上位，但是其诗歌却表现了对人民的极度尊敬和爱戴，他说“我敬农夫如敬佛”，^[9]就表明了其鲜明的态度。他对众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关注与爱戴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韩国诗人，包括那些“和陶诗”与“和陶辞”的创作者。李退溪就曾说：“大舜亲陶乐且安，渊明躬稼亦欢颜。”^[10]作为一个大学者，李退溪所看到的不只是陶渊明隐逸的一面，更看到了其躬耕的一面，并且还特别强调这一方面的功用。在他看来，能够亲自躬耕也是成为圣贤的一个条件和前提，只有真正诚心地与人民或农民接触，圣贤才能平心静气，才能正心诚意。以至在其《和饮酒》第十一首中对于自己向往的得道之士要“春粮欲往从”，^[11]在第十二首中还说：“问君今何为，麦秋正丁时。山泉清可酿，自劝宁有辞。”^[11]虽然其并未表现劳动的艰辛，但是至少这些诗句表明了作者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基本态度，表现了这些诗人与韩国人民之间息息相通的鱼水关系。

申钦的“和陶诗”《劝农》云：

少而窃位，老而为民。梦幻泡沫，谁伪谁真。
去何所归，来何所因。我有密印，闻诸至人。
丹田有种，匪黍匪稷。玉池神水，可灌可植。
昧者何知，不耕不耨。天光泰宇，如日未食。
我杖我藜，遵彼广陆。旭日腾辉，光风载穆。
嘉草争抽，鸣禽队逐。西邻有伴，诺则无宿。
虚则必盈，盈不可久。天地无私，阴阳相耦。
唯士守道，若农易亩。世已溺矣，畴能援手。
以言饰身，言有时匮。以德澡身，圣域可冀。
行之不息，千里斯至。其道伊何，屋漏无媿。
惟贤在野，肉食者鄙。商音动天，穿肘弊履。
其人虽古，尚有遗轨。奈何不敬，之德志美。^[12]

这首诗虽然旨在表明儒家的伦理和修身养性的思想，但是其中很多地方谈到了农事，而且多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作者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无非就是我们本身的德行如同农民的土地一样重要，有“厚德载物”之功用。反之，亦如此。这首诗歌的重点不是农事以及从事农事的人民，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农民或人民的重要性，表现了作者对于普通民众的深厚感情。这样的感情在其他诗人的“和陶诗”或“和陶辞”中也时有所见。

陶渊明也是和普通民众有着深厚感情的诗人，在历史上，他有着“农民诗人”的美誉。在他的诗歌中有很多描写农民及其生活的诗句，或许很多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农民，亲自躬耕、收获，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充分地了解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具体到韩国古代的“和陶”者，在对待农民乃至人民的态度上，他们和陶渊明的区别不只是时代和国籍的区别，更主要的还是身份和地位的区别。韩国古代的“和陶”者基本上都身处上位，是传统的“士”阶层。他们对于农事和农民的认识是不够成熟的，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是浅薄的。但是，这种感情的存在，在客观上表明了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祖国、土地以及其中的人民的深厚情感。

以上所述是“和陶诗”在“朝鲜风”上的主要表现。比如，申钦的“和陶诗”《怀古田舍（一）》中就有“村家风俗淳，迎迓无近远”^[13]的诗句，在其他诗人的“和陶诗”或“和陶辞”中也时有体现。这些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表现了韩国古代独特的风俗、习惯等。

三、诗歌主题的直接与诗学意象的取舍

李仁老的《和归去来辞》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和韵之作。陶辞第一句就直抒胸臆，四个短句，一吐为快，其“归去”的欣喜之情一览无余；而七字句“田园将芜”则点明归处，以“胡不归”反问，语气强烈，是一种积极的抉择，表达了陶渊明归去的决心。然后，陶渊明又在诗歌中表现了他由下定决心到付诸行动的情况，由情入景，表现了作者归去的迫切心情，画面明快、清新、愉悦，确立了全诗的感情基调。李辞第一句流露慕陶、效陶之情，其后则描写了世间事物与自己心态的关系，并在最后归于“无何有”的高妙境界。李辞中借用了大量的老庄文学意象，如隍鹿、塞马、过隙、何有、玄微等，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试图以道家哲学为根基构筑其超越精神的世界，但是这样一来，李仁老的“归去”就不及陶渊明的真实可感，而是显得比较抽象。^[6]

退溪在其“和陶诗”中往往开篇就是一句概括诗歌主旨的诗句，如《饮酒其二》中的“我欲挟天风，遨游昆仑山”，^[11]其三中的“智者巧投机，愚者滞常情”，^[11]其五中的“我本山野质，爱静不爱喧”^[11]等皆是如此。这种诗歌表达上的巨大差异，在我们看来不仅是时代发展所导致的诗歌语言和技巧的变化，更有着民族诗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而且从根本上说，后一点更应该是决定性的。

申钦的“和陶诗”《归园田居》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其《归园田居其一》中就可以看出来，如“获罪圣明时，角巾归故山”。^[14]

虽然，此诗也是在说明诗人归隐田园的理由，以及归隐后自己高兴或者自得其乐的心情，但是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比较就会发现，申钦的归隐更多的是因为外在原因的不得不隐，他自己也说：“余获戾于朝，一逐而归于田，再逐而累于穷峡”，^[15]远没有陶渊明的“性本爱丘山”^[16]那样自然。在诗歌的表达上，虽都在说明自己以前的经历，但是申钦却比陶渊明直接得多。同时，申钦的“隐”少了一些乐趣，以至于他的诗歌更是像进行自我劝服。陶渊明的诗歌语言一方面是平淡的，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委婉的，我们从其诗歌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经》赋比兴传统的影响。韩国古代的诗歌当然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和陶诗”

与“和陶辞”即是如此,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诗人在其诗歌语言上体现更多的是直言其事或直抒胸臆,当他们谈到自己的隐逸之志时,就直接在其诗歌中表达出来,同时在很多时候也表明“隐”的原因。换句话说,陶渊明的“隐”很多时候体现在诗歌内在的意境中,那是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6]的不为世俗所拘的逍遥和自在,可是在“和陶诗”与“和陶辞”中体味到的韩国诗人的“隐”很多时候是由外在环境所迫,他们即使是“隐”了,其身心还无时无刻不与朝政和社会的各种状况联系在一起。或者说,陶渊明的“隐”与韩国隐逸诗人的“隐”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隐”,一种是道家之“隐”,一种则更近乎于儒家的“隐”,尽管韩国的隐逸诗人在文学上深受陶渊明的影响。

韩国诗人在与陶渊明唱和的“和陶诗”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也成为韩国“和陶诗”中“朝鲜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特征就是对陶渊明诗歌中意象的化用。其中,化用频率最高的是“酒”与“桃花源”意象,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韩国古代诗人在其“和陶诗”、“和陶辞”中没有创造出自己性格鲜明的诗歌意象,而是大量化用陶渊明本人的意象来表达与陶渊明相似的隐逸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他们的模仿痕迹,而少了一些创新性,这恰恰限制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使得他们难以在诗歌或者在“和陶诗”上取得像苏轼一样的成就。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诗人没有创新的意识和动力,只是由于他们在创作“和陶诗”、“和陶辞”时所持的思想立场的原因使得他们很少有创造性的表现。

李仁老的《漫兴》:“境僻谁人到,春深酒丰酣。花光迷杜曲,竹影似城南。长啸愁无四,行歌乐有三。静中滋味在,岂是世人谳。”^[17]此诗与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16]的宁静与平和,人与花光、竹影物我混一,人生的种种真谛寓含其中,其“静中滋味在”,换一个字就是“醉中滋味在”。酒的意象在李仁老这里分明坐实了,其实“酒”在陶诗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一种风雅的象征,更是诗人内心焦虑的意象表现,只有借助于酒,陶渊明方能忘却充满苦痛、灾难、恐惧的人生沼泽地,并最终实现“托体同山阿”^[16]的超脱与释然。

萧统的《陶渊明文集序》中“有疑陶渊明诗篇

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16]指的就是这种情形。李奎报“最戚皇亲容恶容,许教狂醉露天真”^[18]亦属此类。

“桃花源”意象是“酒”意象之后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审美意象。从李仁老的《智异山青鹤洞记》、陈湜的《桃源歌》开始,韩国文人千百年来对“桃花源”意象进行了不断的阐释与衍化,或是隐逸时的栖息地,或是幻想中的理想乐园,或是醉后的幻觉,或是春天里桃花满开的旅游地,或是理想化的自然田园。总的来说,韩国古代文人的“和陶诗”或“和陶辞”中的“桃花源”意象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对本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的追忆与明悟,它不断提醒人们在浸染现实红尘的心灵中始终保持着一块净地。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6]中的“菊花”意象是其诗歌中象征意义最为丰富的一个典型,而韩国文人的“和陶”诗歌中几乎寻不见它的踪迹。其他如松树、云、柳树、倦鸟、无弦琴等在韩国“和陶”诗歌创作中也极少见到。

四、结语

所谓“朝鲜风”,本质上就是陶渊明的诗风与韩国本民族的诗歌传统怎样结合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与学习,韩国古代的诗歌接受了中国诗歌的巨大影响,很多时候在一首诗中我们很难区分到底是韩国诗歌传统多一些还是中国诗歌传统多一些。在我们看来,韩国诗歌的这种状况,虽然促进了其汉诗的发展,促进了其对先进文化的接受和发展,但是对于韩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却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韩国诗人深处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中,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和效仿,另一方面也持续地渴望超越。可以说,他们一直处于“影响的焦虑”之中。韩国的“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现象,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仅在于显示了两国长久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史和两国人民深厚的感情,更在于在文学的范围内,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跨界传播、接受、变形与可持续影响的范型。同时,这种现象只有在那种特定的文化与文学场景中才能发生。这种现象在以前的人类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仅有,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上也可能是绝无的。

[参考文献]

- [1] 曹虹. 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1, (6).
- [2] [韩]南润秀. “韩国的和陶辞”研究[M]. 汉城: 亦乐出版社, 2004.
- [3] [韩]朴趾源. 婴初稿序[A]. 韩国文集丛刊(252)[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110.
- [4]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71.
- [5] [韩]李仁老. 和归去来辞[A]. 徐居正, 等. 东文选: 卷1[Z]. 汉城: 民族文化推进会, 1968. 556, 556.
- [6] [韩]李穡. 夏日即事·牧隐诗稿卷16·韩国文集丛刊(4)[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185.
- [7] 吴绍钊. 陶渊明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J]. 东疆学刊, 2001, (3).
- [8] [韩]申钦. 和拟古(三)·象村稿·韩国文集丛刊(72)[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378.
- [9] [韩]李奎报. 新谷行·东国李相国全集·韩国文集丛刊(1)[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144.
- [10] [韩]李滉. 陶山书堂·退溪集1·韩国文集丛刊(29)[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102.
- [11] [韩]李滉. 和陶诗饮酒[A]. 韩国文集丛刊(29)[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74, 74, 73, 73, 73.
- [12] [韩]申钦. 劝农·象村稿2·韩国文集丛刊(72)[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371—372.
- [13] [韩]申钦. 怀古田舍(一)·象村稿2·韩国文集丛刊(72)[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375.
- [14] [韩]申钦. 归园田居其一·《象村稿》卷五十六·和陶诗·韩国文集丛刊(72)[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372.
- [15] [韩]申钦. 和陶诗序[A]. 韩国文集丛刊(72)[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370.
- [16]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76, 247, 247, 425, 614, 247.
- [17] [韩]李仁老. 谩兴[A]. 徐居正, 等. 东文选I: 卷九[Z]. 汉城: 民族文化推进会, 1968. 669.
- [18] [韩]李奎报. 呈安和寺宗室五禅师·《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1)[C]. 汉城: 景仁文化社, 1996. 307.

[责任编辑: 张振亭]

On the “Korean Style” of “Poems to Echo back Tao” and “Verses to Respond to Tao”

CUI Xiong-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the well-known poet in Jin Dynasty of China, was highly praised in Korea. Poets of ancient Korea had created a great number of “poems to echo back Tao” and “verses to respond to Tao” since Koryo Dynasty. Poe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ll tried to seek for certain cultural essences such as spiritual power or artistic styles from Tao Yuanming. The creation of the poems and verses reflected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nation and the poets’ national emotions. Besides, attitudes about the style of the topics and the choices in the acceptance were also demonstrated. In fact, it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national awareness establishment, but also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fluence” to the “Korean styl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poems to echo back Tao”; “verses to respond Tao”; “Korean style”